

（二〇一五年五月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史实辨析】	“否定”并未彻底，“真相”仍待揭示 ——从文革中的清华与广西谈起（下）	秦 晖
【亡灵祭坛】	清华大学“文革”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统计表	唐少杰
【千秋功罪】	林豆豆——现代史上最大的悲剧人物	芦 笛
【人物春秋】	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疑惑——记朱永嘉先生	朱学勤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史实辨析】

“否定”并未彻底，“真相”仍待揭示
——从文革中的清华与广西谈起（下）

· 秦 晖 ·

（编注：本文为《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序言）

（上接 zk1504c）

◇ 当权派镇压造反派的标本

广西的事如今已经相当有名。我们不必寻找什么民间野史和回忆之类，1980年代广西官方编辑整理的处遗资料中，当年镇压四二二时令人发指不忍卒读的残酷场面就连篇累牍堆积如山。诸如逼迫儿子当众亲手砍杀自己父亲（永福、都安、巴马等县）、残杀被害者后又强奸轮奸其妻女，奸后杀死并剜乳割阴、取肝而食，满门抄斩并洗劫房屋财产供凶手私分（武宣、蒙山、邕宁、融水、浦北等县）、杀人后变相贩卖其妻女勒索“改嫁费”（浦北、资源等地）等等。正如读过这些“处遗”材料的人形容的：“杀人手段残忍至极，成批杀人到处有之，成批敲死有之，成批爆破致死有之，成批戳死有之，成批掷下矿井有之，成批丢下山洞有之，剖腹挖肝有之，割肉挖眼有之，割头示众有之，吊割阴茎有之，先奸后杀有之，杀夫奸妻、杀父奸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广西大地，腥风血雨，冤案如山，悲惨状况，史无前例。”〔34〕请问在整个文革时期，在全国范围内，“造反派迫害走资派”何时、何地、有哪一次残暴、野蛮、血腥到如此程度？

处遗材料还证实，当时广西共有武宣、灵山、隆安、天等、浦北、上思、武鸣、崇左、马山、钦州、合浦、上林、邕宁、容县、宾阳、都安、忻城、钟山、来宾等19县和柳州市发生了杀人后挖食肝胆及人肉的骇人事件——而且很多地方是成批地、有规模地发生：隆安发生21起，灵山发生25起，武宣竟达75起。后来曾有人说这与广西少数民族的落后传

统有关，并特地指武宣县70%人口为壮族。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笔者根据处遗资料中“吃人”事件的地点和规模在广西民族分布地图上作了标注。图中明显可以看出：广西民族分布的基本情况是东部主要为汉族，西部少数民族为主，由西至东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递减、汉族比例递增。而那些极端残忍野蛮的吃人事件全部发生在中、东部的汉壮混居地带，其中吃人案例次多的灵山和浦北、钦州、合浦、容县等地基本是汉族区，少数民族人口极少。而广西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最大、经济社会也最不发达的西部（百色、河池两地区）反倒没有这种事。

进而论之，其实我们现在讲的民族分布是1950年代“民族识别”运动和后来的政策下形成的，实际上就文化、社会特征论，广西真正具有原生态民族特点的地方只有西部的百色河池一带，中东部居民无论血缘上的“族源”如何，实际文化社会状态早已高度汉化。按民国时期的人口统计口径，广西只有63万左右的少数民族〔35〕（其定义与我们现在不同，如白崇禧是穆斯林，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回族”，而只认为是信伊斯兰教的汉族，与信基督教的蒋介石也是汉族一样），基本都在前述的西部，文革中那里根本没有发生吃人事件，而吃人案例最多的武宣按这一标准其实也是汉族（至少是汉文化）区。

显然，文革中广西的吃人惨剧与“民族文化”没什么相关性，那么它与什么相关？处遗资料明确显示：武宣县被吃者75人都是造反派四二二成员、倾向四二二观点的干部、群众，以及根本没有派别表现但却被指为造反派“社会基础”的“黑五类”及其家属，包括支持四二二的2名党员、3名干部在内。而参与吃人的130人中，居然有党员91人、干部45人，非党非干的“群众”只有21人。吃人案例第三多的隆安县同样如此：参与吃人的41人中，党员36人，干部8人，“群众”只有2人；处遗时该县因吃人罪行被处分、判刑共21人，居然全部是党员，三人是干部。（36）根据处遗一整党总结时统计，当时全广西共有近五万党员在“非武斗”状态下参与杀人，其中20875人是入党后杀人，9956人因杀人“有功”入党，17970人“与杀人有牵连”。根据“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原则，处遗的结果是全广西共有2.5万党员被开除党籍。（37）

很明显，这种暴行的来源是二位一体：一是文革前就不断宣传并步步强化的“阶级斗争，你死我活”观念及据此在社会上制造的以“出身”、“成分”好坏区分贵贱的现代种姓制度，在一定条件下走向极端就变成了“高种姓”对“低种姓”的屠杀。二是文革前当权派以地方驻军、各级武装部和官办民兵组织、基层政权为依托，组织、支持、发动所谓“老保”对触犯了他们的“造反派”实行报复性镇压。而这些造反派有的纯粹因为相信了某种上边灌输的说法而“奉旨造反”，有的则与过去积累的官民矛盾和体制积弊有关。尽管真正的低种姓贱民极少敢参加“造反”，造反派也尽可能回避这些人，但是他们的对手总是要把这两者归到一块，以便于镇压。

广西的暴行之残酷程度固然极端而罕见，但其基本行为逻辑却并不罕见。如闻名的湖南道县大屠杀，过去尽管其残暴已广为人知，但其原因却极少分析，甚至常常归之于“造反派杀人”。后来详情披露：其实恰恰相反，当时的情况是湖南省城造反派“湘江风雷”崛起后，“老保”势力强大的湘南各县基层组织以武装部、官办民兵为支柱，为“防止湘江风雷下乡”，在镇压当地弱势的造反派之余，对被指为造反派社会基础的“黑五类”和其他贱民“先发制人”实行斩草除根的屠杀，据说这可以阻止造反派势力蔓延。（38）实际上，道县所在的湘南与广西接壤，广西北部很多地方的屠杀，如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之类，都是湘桂两地互相交流、互相取经的。

这种当权派假手所谓“老保”残害“造反派”的事件，当然不止发生在广西和湖南。宋永毅主编的《文革大屠杀》一书，收集了湖南道县大屠杀、内蒙古内人党大血案、广西四二

二被剿杀、青海二二三事件、广西宾阳惨案、北京大兴县惨案、云南沙甸事件等共七宗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其中除大兴惨案发生于尚未有“造反派”“保皇派”之分的1966年“红八月”、内人党与沙甸事件事涉民族关系外，其余四宗屠杀都是发生在1967—1968年的大乱期间，而且都是当权派屠杀“造反派”和被莫名其妙指为后者社会基础的“黑五类”。

◇ 两个极端之间：造反派的共同命运

清华的情况当然与广西大有不同，死亡的规模也完全不可比，但耐人寻味的是不少人也指出：以“宣传《七三布告》制止武斗”为由头进入清华的工宣队，在其掌权时期，清华的“非正常死亡”也比蒯大富得势时更多！

当然，广西的情况不仅与清华，与其他各省相比也有些特别之处。最明显的是广西文革前第一把手韦国清文革中成立革委会后仍然是第一把手。当时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第一把手都曾倒台过，全国类似韦国清这种情况的仅有河南的刘建勋和黑龙江的潘复生。（39）但是，刘潘二人都是得了内线消息第一时间出来支持当地造反派的弄潮儿，随着形势变化后来实际掌权的时间也不长，唯有韦国清从未支持过造反派，而且一直主政广西，他到广州和北京高升后，广西的权力也一直在他扶植的亲信手里，直到1983年中央为解决广西处遗问题专门调整自治区领导班子前，广西实际上一直在他的势力控制下。

不过，人们切莫因此以为韦国清是个中央奈何他不得的地方“诸侯”或“藩镇”，传说他因为与越南有特殊关系所以为中央所仰赖，更是没有道理。（40）韦国清是广西壮族人，而且是广西右江苏维埃红七军出身，有人因此认为他的执政有地方或民族或红七军背景，甚至称他为“邓小平（红七军领导人）嫡系”、“中共的桂系”、“广西王”或“壮王”。但实际上，韦国清在当时广西人心目中主要是个“南下干部”，他治桂的最大特点恰恰在于一直以严厉打击“地方主义”、“民族主义”为动力取悦于中央。从某种意义上讲，韦国清可以说是“广西的斯大林”：他作为壮族人却依靠“南下干部”用中央集权主义打压壮族人，就如当年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以“比俄罗斯族更狂热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来镇压格鲁吉亚同族一样。关于壮族，韦国清的名言是：“壮族（与汉族相比）没有特点，依我看，这恰恰是壮族的特点，这正是壮族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的地方”。据说他曾要求《刘三姐》主角的服装不要突出壮族特色，而要突出“劳动人民”特色。（41）

从1955年在广西任职以来，韦国清都极善于揣摩圣意，在人事上高度依靠外来干部和“南下干部”。广西地下党、边纵游击队出身的地方干部、“红七军老战士”乃至他故乡东兰凤山一带的壮族乡亲被他整得最厉害。“壮王”、“二壮王”曾是他扣给地方干部的帽子。而凤山“革老”（革命老人，即红七军老战士（42））大都反韦，使该县成为四二二在广西农村地区少有的根据地，文革中也被韦屠杀得最厉害——全县人口1.3%死于非命，死人比例为全广西之冠，其中“革老”就有149人遇害（43）。韦国清的东兰壮族同乡兼红七军老战友韦祖珍文革中被中央调回广西与他搭档做第二把手，没两年就被韦国清借九一三事件之机打成“林彪死党”，几乎整死。（44）韦国清的老首长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在苏区肃反中被冤杀，延安时期已平反并宣布为烈士，1949年后其在广西的家属因此很受尊敬，但文革时韦国清和广西当局在带头“批邓”（45）的同时又宣布李是反革命，“大有鞭尸扬灰之势”，家属也被整得“家散人亡”，（46）直到韦国清调离广西、文革结束，经邓小平直接过问，才恢复了历史的公正。又如而今闻名天下的“壮族歌仙刘三姐”，本是源自广东汉族地区的民间传说，传入广西后于1950年代末被当时广西区党委文教书记、广东籍汉族干部伍晋南调集文化力量将其打造成广西壮族的“文化名片”。可是

文革中韦国清狠整伍晋南，炮制“大毒草”《刘三姐》成为伍的大罪之一，整个文革十年中这“壮族歌仙”一直被“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国清封杀……。

韦国清何以能成为“政治不倒翁”是另一个话题。这里要说的是：他在广西的作为并不是一个“土司”、“诸侯”的行为，反映的也不是什么地方或民族的“传统”，而就是一个成功揣摩圣意的跟风者、一个极权体制下无法无天的地方官僚，这在当时不能说没有代表性。只是由于韦国清从未失势，反对他的造反派广西四二二也就从未像“井冈山”在清华那样一度得势。广西因此也成为当权派镇压造反派的一个极端典型。而在清华，文革初期工作队打倒了蒋南翔，毛泽东又打倒工作队并扶植蒯大富得以称霸清华园一年多。但是我们不妨设想：如果蒋南翔与工作队是一回事而且从未倒台（假如清华有个“韦国清”），蒯大富（假如他还会“跳出来”做清华的“四二二”）的遭遇又会如何？

在清华，工作队扶植的“保爹保妈派”狠整过蒯大富，但他们很快就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干预下垮台了，后来的清华严格地说没有典型的“老保”。四一四是从“井冈山”中分裂出来的，当然，从“四一四思潮”重建文革前秩序（“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论）的想法看有点接近于“保”，但基本上还是被毛泽东看成造反派中的异端，后来和团派同归于尽都被毛泽东卸磨杀驴了。不过几年后（请注意：无需40年）回头看，老四的人还是比老团的人更能被体制接纳，但比他们两者都更能的，还是当年的“老保”。那么，假如“老保”始终没垮，清华园又会是什么样呢？蒯大富等人又会如何？

在当时的中国，清华与广西几乎是两个极端了：由于在皇城根下直接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扶植，“老保”早就没了踪影，造反派之得势天下第一，“百日大武斗”中蒯大富亟欲踏平四一四的气焰与广西“老保”踏平四二二的声势一度近似——但仅仅是“一度”。别看毛泽东在“召见”时贬损四一四，但毛泽东其实是绝对不容蒯大富踏平四一四的（否则十个四一四也不可能“绝处逢生”！）。然而，毛泽东却非常乐见广西“联指”踏平“四二二”。如果说在清华这一个极端中造反派的下场最终也还是比“老保”惨（请注意，我这里指的不是他们在邓小平时代的下场，而是指在毛泽东时代的下场），那么处在另一个极端的广西四二二下场就不必言了。

事实上，无论韩爱晶、蒯大富们如何自命为“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并竭力与外地那些“不可靠”的、在野的、弱勢的造反派划清界限，最高层还是把他们归为了一类。从林彪那句“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足可见这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别何等牢不可破！尽管蒯大富与广西四二二毫不相干，蒯大富之曾经得宠于毛泽东和韦国清始终恨四二二入骨更是两个极端，但就是因为那个其实蒯大富与四二二都并非主要角色的“清华、北航黑会”，他们还是最终被搞到一起了。其实，即使没有这个“黑会”，他们的命运也不会有多大不同——正如7.27蒯大富“误判”了而韩爱晶并未误判，但他俩的命运也没有多大不同一样。

其实，这个“黑会”虽然被当局强加了莫须有的“重要性”，但当时各地造反派，无论曾经得势的还是从未得势的，都感到大难临头，纷纷来京鸣冤求救，以至于聚到了一起，这还是非常富于象征性的。据说当时北航红旗的祝春生在会上曾大骂那些与会的“不可靠”外地造反派，说他们“反军”惹祸，还自夸我们北航红旗从来不“反军”，从来跟解放军保持一致，所以能够屹立不倒。而且据说康生看了这个发言记录还说讲得好——可是话音未落，祝春生还是进了黑牢，（47）并没有比那些“反军”的家伙幸运多少。

◇ 上海并非例外：论王洪文何以持续受宠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其实按英明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1967年已经“轮到小将犯错误”了。只是由于武汉七二〇事件陈再道的意外犯上，毛泽东、江青又“额外”地宠了一次造反派。但是没过多久，“伟大战略部署”还是回到了原定的轨道。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利用造反派狠整刘少奇等他假想的政敌，主要是在北京的事。因此他宠幸北京造反派倒是比较特殊的。这一点就是上海也比不上。人们一般都以王洪文为造反派得宠的典型，其实，王洪文之所以能够在毛生前一直得宠，恰恰是因为他这个“造反派”非常另类，非常不典型。有人认为毛泽东抛弃蒯大富而久宠王洪文，是因为毛的意识形态重工人而轻知识分子。其实大不然。当时工人造反派比学生裁得更惨的例子不胜枚举，事实上“一月风暴”以后，各地对造反派卸磨杀驴大都就是从“工总”之类的工人组织、而不是从学生组织开始的。（48）

而王洪文能够持续得宠的主要原因，既不在于他是工人、也不在于他是造反派，更不在于他是“工人造反派”。他主要就是因为死保张春桥，而与张的得宠共始终。至于他反对刘少奇，甚至他反对陈丕显曹荻秋这些上海的“走资派”，则与他的“工人”身份（49）一样，都不是他持续得宠的主要原因。

我们知道身在上海的王洪文不仅对打倒刘少奇没什么贡献，甚至在上海的造反中他本来作用也不是最大的。他原是上棉十七厂的保卫干部，直到1966年11月间“造反”大潮形成、旧市委垮台已成定局时他才出来参与组织了“工总司”。不要说与北京早在这年初夏就奉旨发难的聂元梓和奉旨前就先忤逆了王光美的蒯大富相比，就是与上海最早起来造旧市委反的复旦“红革会”等学生组织相比，甚至与上海工人中先于他而造反的潘国平等人相比，王洪文的“造反功劳”也不是很大的。他崛起的奥秘就是在安亭搭上了张春桥，而后王张投桃报李又搞掉了其他造反派——先是王洪文力保张春桥，镇压了炮打张氏的“红革会”等“老造反”，再是张春桥支持王洪文，血腥镇压了反王洪文的造反派“上柴联司”（及上柴之外的“支联派”）。

除这两个镇压外，也许并非更不重要的是一个镇压，即早在“一月革命”时就成为“上海特色”的镇压“经济主义”，（50）正是这三个镇压而不是他先前的“造反”，决定了王洪文能够继续高升。尽管当时楞说“经济主义”是“走资派”煽动的，但谁都知道那恰恰是“造反”与老百姓（尤其是下层百姓）利益相关的部分，如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要求转正，下乡知青要求返城、荣复转退军人要求改善待遇等。但凡“造反”如果在为高层权争火中取栗之外还有百姓自己的利益诉求，那就是“经济主义”。反“经济主义”是典型的矛头向下，与“造走资派的反”完全相反。如果说厂保卫干部镇压临时工也叫造反，那与“贵胄红卫兵”殴打“狗崽子”的“造反”有何区别？为什么后者就叫做“老保”？而今天的“城管”抓小贩也可以叫“造反”吗？

这里有争议的可能是“上柴联司”，今天它被研究者认为是个十分特殊的案例：它主要由草根群众与“17年受压制者”组成，而且反对本厂领导，这与当时“造反派”一般社会学特征相符。其对立派则多党团员与政工干部，更像是“保皇派”。但由于上层矛盾的特殊原因，上柴联司迟迟未卷入对上海市委的“造反”，很多成员还参加过市里的“保皇派”

（即“赤卫队”），而其对立派则投靠工总司，更早参加了市里的“造反”。因此一些人把上柴联司视为“保皇派”，王洪文后来镇压它时也是这么说的。（51）其实，由于官场矛盾和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当时的组织对一个或一级官府造反，而对另一个或另一级官府亲近，是常有的事，何况联司作为整体也并未参加过“赤卫队”，倒是参加过工总司（只不过参加较晚，而且主要联系的是工总司中与王洪文内讧的那些人），更重要的是，到1967年一月后，还有谁不造旧市委的反？笔者认为从群众性“造反”体现出对“17年”官僚体

制不满这一点看，定义“造反派”应该主要看社会学特征和意识形态背景，而不是看对某个具体当权者的态度。对17年体制（有时未必是对整个体制，而是对自己在体制下的具体生存状态，比如受工作队的压制等）不满，但又接受当时官方意识形态、并以此为“造反”理由的，就是“造反派”。——如果对体制不满而且反对当时的意识形态，那在当时就算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而不是“造反派”了。

就此而言，上柴联司无疑属于造反派，而且比王洪文更典型。另外，“造反派”在当时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是当时特殊形式的组织多元化的产物，大一统的官办组织无论持何种观点都不能说是“造反派”。从这一点看，1967年8月上海的“造反派”也应该是上柴联司，而不是王洪文及其工总司。

换言之，与其说王洪文与蒯大富类似，不如说“上柴联司”与广西四二二更类似。1967年盛夏几乎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武汉陈再道支持“百万雄师”镇压“三钢三新”与上海张春桥支持“工总司”镇压“联司”派，性质其实差不多。毛泽东当时对两者的态度截然相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陈再道这个莽汉冒犯龙威惊了圣驾，而张春桥又恰恰是毛的近臣。但是这样的截然相反造成政策混乱，近一年后才调整过来，于是武汉的“三钢三新”也被抛弃了——而在武汉以外，这一次不但“四二二”的结局比上柴联司更惨，连“清华井冈山”也成了上柴联司的北京版——蒯大富看到数万工宣队进校时，顿时想到的恰恰就是工总司踏平上柴的情景！（52）

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把“清华井冈山”作为造反派一度受宠的极端，而“广西四二二”作为造反派从未受宠的另一极端，那么清华这一极端其实比广西更特殊、更不普遍。北京以外的全国各地，甚至包括过去常被视为造反派持续受宠典型的上海在内，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其实都更接近于广西，而不是更接近于清华。当然，即便是清华，最后也是在发展方向上（尽管不是在残酷程度上）向广西看齐了。

◇ 余论：领袖利用了造反派，还是造反派利用了领袖？

回顾清华文革与广西文革的往事，令人叹息更令人深思。作为两个极端，似乎再也没有比清华造反派与广西造反派差别更大的了，不说早先的受宠与否，直到七三布告发布时，四二二在广西正被别人“踏平”，而井冈山在清华还要“踏平”别人，但这么大的差别也没有避免他们很快还是殊途同归都被毛泽东镇压下去。而对于武传斌发起、北航主要接待的“黑会”而言，清华井冈山和广西四二二其实都算不得主角，而且事实上两者并没有联系（两者都只是各自与武传斌有接触），但在中央首长嘴里，事情却变成了广西的“土匪”进京向清华的“黑司令部”“汇报”！更怪的是“黑会”的真正主角武传斌蒙受的后果也远没有清华人和广西人那么惨：武传斌后来三进三出牢房，但时间都不长且始终未获刑，而清华老团获刑者累累，四二二更是被浸在了血海里。很多人都说清华文革在全国文革中具有最突出的典型意义，其实，就造反派先受领袖利用后被领袖镇压而言，清华无疑是造反派被利用的典型，广西则是造反派被镇压的典型。两者合起来倒是构成了中国文革最完整的典型图景。

对于像广西四二二那样的造反派被残酷镇压和野蛮屠杀，今天是怎么谴责也不过分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四二二就是正确的。“奉旨造反”结果却被“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固然可悲，但他们所奉之旨也很不人道，他们也喝过“狼奶”，得势起来也会很凶，就像清华井冈山得势时那样。广西四二二作恶远比镇压者少，原因并不是他们的主张正确，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势的机会罢了。我一直认为，无论就17年极权体制下积累的官民矛盾，还是就“五十多天来”当权派首先发动“反右式文革”整老百姓（如工作队整蒯大富）造成的新民怨而言，文革中的群众“造反”形成如此规模，并不能仅仅用“奉旨”来解释，它是有社会土壤

的，即使今天看来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但这就犹如旧时的农民反官府一样，值得同情并不意味着它（如海外一些“人民文革”论者所言）就是“民主派”。把中国文革时的造反派混同于波兰的团结工会是完全不对的。在当时的中国，有社会土壤的造反仍然得“奉旨”发难，值得同情者也做了不少火中取栗的傻事和乌烟瘴气的坏事。不过这是领袖利用造反派作恶（利用完又镇压了他们），而不是造反派利用领袖作恶，这个基本事实是不能颠倒的。现在看来，当时完全没有被利用的“造反”恐怕只有所谓上海一月革命中被张春桥王洪文等人镇压下去的“经济主义”造反，最底层的劳动者要求改善待遇，不仅在“社会主义”之下应该天经地义，“资本主义”也都还承认劳工运动合法呢。即便当时的经济条件难以满足他们的这些要求，也不能剥夺他们提出要求的权利吧！然而当时不仅王洪文这种“另类造反派”，就连红革会这样的“典型造反派”也参与了镇压“经济主义”，可见中国一般造反派与“人民文革论”所说的“民主派”距离有多大。

揭示这些真相的意义重大。1980年代邓小平“彻底否定文革”本是对的，但当时的历史局限决定了这一“否定”仍然是基于当权派利益本位的立场，因此不仅“彻底否定”其实并不彻底，更重要的是也有失公正：那时的“否定文革”主要就是“否定”造反派，文革被描述成“造反派迫害走资派”的单一图景。以至于文革过去40多年后，年轻人知道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支持‘造反派’整‘走资派’，邓小平抬举‘走资派’肃清‘造反派’”。这个“事实判断”很少有人质疑，双方只是价值判断相反：有人说毛主席支持人民反官僚是对的，有人说老百姓犯上作乱不行，邓小平平定造反才对了。如果只是在这样的“事实”上讨论，那就永远不能搞清文革灾难的教训、也没法认识改革的意义。其实不仅是中国人，就是傅高义这样的外国学者也如此，他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仍然把迟群等人称为“造反派”，（53）其实这些人恰恰是毛泽东派来镇压“造反派”的——但是迟群治下被整死的人却要比“造反派”蒯大富治下更多。文革中当然有“造反派”迫害“走资派”的一幕，但绝非仅仅有这一幕，而且如果我们承认“十年文革”之说，那么这一幕其实非常短暂。重要的是几个被忽视的“真相”：“造反派”得势时确实也很野蛮，但那时镇压他们的人往往更野蛮，总的来说在那十年中，“造反派”的受难百倍于“当权派”和“保皇派”。而就造反派本身来说，他们受难最惨的主要是在毛泽东时代，而非邓小平时代。

另一方面，“走资派”（老干部）长期受大难、改革后才解厄者固然不少，但其中受“造反派迫害”只是一瞬，90%的时间他们是受的“常规党内迫害”，与根本没有造反派之说的苏联克格勃黑狱没什么本质区别。“彭陆罗杨”受难时，“造反派”还远没有问世，而王光美一直被关押到1976年，难道那是蒯大富关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名实”分离，说的与做的相反。正如今天几乎100%的当年“右派”都已平反，但“反右”仍被认为“必要”一样，当年毛泽东把95%的“造反”者都收拾了，理论上“造反”却仍被说成是对的。而与毛生前对造反派的残酷镇压相比，邓小平时代虽然理论上整体否定了造反运动，并清理了一些“三种人”。但不仅这种处理无法与毛泽东的镇压相比，而且事实上，大量造反派的冤案却是在邓时代得到纠正的。关于文革，无论是官式的“彻底否定”还是“毛左”的“毛主席支持民众反官僚”论都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把“造反派”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事绝大多数是发生在毛泽东时代，而不是在邓小平时代。而真正带有“人民文革”色彩的造反，如前述知青要求回城之类的“经济主义”造反，毛泽东时代不但官府镇压，主流“造反派”也排斥之，反倒是在改革初期，很多这类“造反”取得了成功！

邓小平时代以清理“三种人”的名义把残留在党政机关中的一些曾经的造反派予以驱逐，一些人还被判了刑。但其实到1976年时仍然得势的“造反派”人士不但已经极少，而且大都像王洪文那样以镇压其他造反派的方式交过“投名状”，实际上已不再是造反派而

只是文革新贵。这场“清理”对“造反派”的打击其实远不如毛泽东时代的镇压。更有不少如蒯大富这样的人其实在毛泽东生前已经坐牢很久，但那时盛行的是不讲任何理由和程序的随意关押、无限期的黑牢；即使放出来也是“黑五类”式的贱民，无法拥有正常生活。邓小平时代开始讲“法治”，把他们正式审判定罪，判了刑期。尽管从今天的角度看，那种审判实际还是“政治挂帅”，“法治”水平很低，也未必公正，但由于此前的羁押折抵刑期，他们中不少人其实在毛泽东时代坐牢的时间还长于邓小平时代。出狱后尽管也受到歧视，但程度比毛泽东时代对贱民的歧视差得远，他们基本上都能恢复正常生活。

更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时代虽然理论上彻底否定了在毛泽东时代受到理论肯定的“造反派”，实际上却有很多毛泽东时代镇压造反派的冤案，是在邓小平时代被平反的。这实在是历史的吊诡！例如改革初年获得平反的最出名的几个文革中遇害的异议人士（有的平反后被宣布为烈士），当年他们其实并非同一立场，其中因反对打倒刘少奇而被害的张志新自然不是造反派（她应该算“保守派”），但遇罗克（因编辑造反派的《中学文革报》反对保皇派的“血统论”而遇害）、李九莲、钟海源（都在军人政权镇压造反派时遇害）等多数人其实都属于造反派。还有那些活着的人：武汉的鲁礼安、湖南的杨曦光（即后来名满天下的杨小凯）、广西的钱文俊等，他们不仅是造反派，而且是造反派中最激进者，他们都是毛泽东时代坐大牢、邓小平时代获平反的。

那时冤死的人除了“贱民”以外，肯定以造反派居多——至少比“走资派”和“保皇派”多，这些被平反者自然也是如此。典型的是笔者的家乡广西等地，文革中对“造反派”成千上万地大举屠杀，可谓惨绝人寰。那也是邓小平时代被平反、得以恢复公道的。1983—87年间“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在那里是无人不知的一个词。处遗中被惩罚的一些杀人者按当时的政治口径都被指为“造反派”，其实他们固然罪有应得，但说他们是“造反派”就与事实刚好相反了——他们是文革前当权派的御林军。而大量的广西“造反派”恰恰是在邓小平时代从地狱回到人间的。

因此就不难理解，尽管今天有不少不懂历史的年轻人从“造反派反官僚”的角度同情文革，但实际上在1970—80年代之交，走出文革、实行改革是包括绝大多数前“造反派”和“走资派”在内的几乎所有国人的共识。只是当时改革主导者是复出的当权派（文革中所谓的“走资派”），按他们的意图进行的改革固然基本上符合上述共识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偏见和扭曲还是不少，改革之路远比当时人们想的复杂和坎坷，对文革的反思自然也是如此。这也就是孙怒涛先生主编本书的意义所在。

注释：

1. 2013年6月23日访谈蒯大富，深圳。关于这个话题他也有过多次文字表述。
2.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627页。
3.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班办公室记录整理：《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指示》，注明的整理时间为1968年7月26日，28日起该文件在广西以传单、号外等形式大量散发。本文据宋永毅等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2006）光盘收录文本。按：1967—68年间中央首长每次接见广西两派的记录都有两派和广西官方（军方）各自整理的两三个文本，但最后一次接见时“四二二”事实上已经失败，所以只有这一个文本。
4. 2014年8月10日访谈中笔者就此问过朱仁本人。

5. 就我所见，似乎只有当时北航红旗的戴维堤在其自传《逝者如斯》中介绍了此会的始末。但是他与武传斌一样也称之为“北航黑会”，不认为有清华的什么事，其实清华受此会的影响应该比北航更甚。

6. 7. 28 召见记录，见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2006）光盘收录文本。

7. 武传斌电邮。

8.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班办公室记录：《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指示》，1968年7月26日整理，宋永毅等编：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2006）光盘收录文本

9.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班办公室记录：《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指示》，1968年7月26日整理，宋永毅等编：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2006）光盘收录文本

10. 2014年8月10日访谈朱仁，南宁。另据朱仁接受旅美学者谭家洛访谈时说，他在会上并没有听到辽宁八一提议建立全国造反派组织。这番惹祸言论大概是在他未参加的会上说的。此条承谭家洛先生告知，谨此致谢。

11. 2013年7月8日电话访谈钱文俊

12. 2013年6月23日访谈蒯大富，深圳。按：清华四一四方面的消息说蒯大富的发言则相当火辣：“1.除河南、青海外，全国现在是保守派掌权；2.现在不是中央支持造反派的问题，而是反之；3.全国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内战。”（见邱心伟、原蜀育主编：《清华文革亲历大事日志》，1968年7月23日条，此信息为孙怒涛先生提供，谨致谢。）但多名与会者都没有这个印象。

13. 叶曙明：《迟泽厚访谈录》

14. 戴维堤：《逝者如斯》之73《北航黑会》，乌有之乡网站

15. 2014年8月10日访谈朱仁，南宁

16. 接见中有人说看过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康生驳斥道：“我说的是《哥达纲领》”。但《哥达纲领》全文本身只有短短四节，马克思认为它“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批判”，因此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逐条逐句”地引述该纲领并予以了驳斥。这些引文其实就是《哥达纲领》的全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9卷，第8、11—35页）因此根本不存在看过《哥达纲领批判》却没有看过《哥达纲领》的问题。康生这样驳斥其实恰恰表明他这个“马列主义权威”其实倒真可能没有看过马克思的这本“经典著作”。

17. 戴维堤：《逝者如斯》之73《北航黑会》，乌有之乡网站

18. 现在一般说是“进入”清华，其实当时工宣队虽然没带枪更没动枪，但却是事先不打招呼的突然性强制行动，三万多人包围一千左右的在校学生，不仅“强行缴械”、拆毁武斗工事，做了“制止武斗”所必需做的事，而且查抄了学生组织的办公室（当时谓之“抄家”），抓了不少人。事后他们即成为清华的主人。所以，这是一次典型的强制占领行动，尽管占领者没带枪，但甚至不能说是“和平解放”。因为和平解放也是要有协议的。而团派即便不抵抗也未发生不幸的流血事件，他们也是被强制撵走的，已经不是“傅作义”了。

19. 7. 28 召见记录，见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2006）光盘收录文本。

20.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635页。

21. 李仕林：《朱勇访谈录》，见本书。

22. 见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341页

23. 转引自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347页。

24.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628—629页。

25. 即“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文革前和文革中广西当权派韦国清支持的所谓“老保”组织，“四二二”的对立派，当时始终处于强势地位。

26.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1988年）第18册，287页，据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收录文本。

27.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1987年）第1册，3—5页，据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收录文本。

28.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1987年）第7册，129页，据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收录文本。

29. 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简称，在广西当时这是个家喻户晓的语词。

30. 所谓最小数字，指逐个核实后有名有姓有死亡情形可查、处遗中分别落实了政策的、精确到个位的数字，除了后列的这组数字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1册“前言”说是“八万五千多人”。宋永毅先生曾根据这套资料中的各县死亡资料自行汇总统计，“大约是十五到十六万”，（宋永毅：《血雨腥风中的广西文革真相：读十八册广西文革档案资料》，《开放》2013年10月号，75—78页）。参加处遗的中央工作组成员、公安部干部晏乐斌说：“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有八点九七万人”，“另外，全区失踪二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三万多人。”（晏乐斌：《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而前南宁市委副书记袁家柯在他写给中央组织部的处遗申诉书中说是“20多万”（袁家家藏文献），这应该是民间流传的说法。

31. 按：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于1968年8月26日，时在《七三布告》发布50多天后、也在对四二二的“剿灭”结束后。有人提出：何以整个《七三布告》后死的人占比只有60%不到，而内含的“革委会成立后”死亡占比却高达85%？其实细看处遗资料即可明白：这里所谓的“革委会成立后”并非仅指自治区革委会，各地、市、县分计的死亡数都是以当地革委会成立来分前后的。而各地市县革委会成立均在自治区革委会之前（第一个县级革委会成立于2月20日），而且（除桂林市等个别例外）均为韦国清支持的一派掌权，成立后即以剿灭当地四二二为第一任务。到《七三布告》发布时大部分地市县的剿灭已经完成。剿灭过程中各地县四二二成员大量逃亡南宁、柳州、桂林等大城市。《七三布告》发布后这些城市的四二二也被剿灭，自治区革委会遂在“捷报”声中成立。所以，各地革委会成立后的死亡数比《七三布告》发布后的死亡数更大是很自然的。

32.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1987年）第7册，127页，据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收录文本。

33.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1987年）第7册，128页，据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收录文本。

34. 《广西文革武斗惨况》，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4411668/2717/93/77/6_1.html

35. 据《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度广西统计年报》。按此为民国时期广西人口统计中少数民族（时称“特种民族”）最多的一次，还有几次人口统计的少数民族人数和比例更少。见卢露：《从桂省到壮乡：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壮族》，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59—60页。

36. 黄家南：《血雨腥风的岁月——广西文革实录》，2014年自印，556—562页。（此书实为处遗档案18册的资料摘编）

37. 宋永毅：《血雨腥风中的广西文革真相：读十八册广西文革档案资料》，《开放》2013年10月号，75—78页。

38. 参见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39. 刘建勋当时已调离河南，但由于继任的文敏生不受中央文革信任，又被中央派回河南去取代文并支持造反。潘复生则是从哈军工的一些“通天”人物中得到消息，出来领导“东北的新曙光”的。

40. 与外国（哪怕是亲密的“兄弟国家”）有特殊关系，对中国高官尤其是封疆大吏而言恰恰是惹祸的大忌。

41. 蒙雄强：《壮族上将韦国清的点点滴滴》，《文史春秋》2010年第3期。

42. 当地又有“三老”之说，即老红军、老赤卫队员、老游击队员，总之也是参加过右江苏维埃运动的老人。

43.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1987年）第5册，195—196页，据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收录文本。

44. 所谓“林彪死党”到底能否成立，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固然与林彪关系密切并与张春桥江青等人有矛盾，但是否与林共谋反毛，这都是历史上的疑问。但无论如何，黄吴等人至死都未能翻案。而韦祖珍文革后很快获平反，可见他与林系其实没什么瓜葛，其被整完全是因为他那个老乡的构陷。有趣的是，平生转战南北的韦祖珍只回桂工作了两年就被韦国清赶出广西幽禁他乡，临终仍要求落叶归根并终于葬在了广西，而主政广西20年的韦国清却化桑梓为怨府，最终选择了北京作为他安息之地。

45. 韦国清本人不仅在1967年1月出面具名“揭发”邓小平，1976年广西当局（其时韦已升迁，继任者为其提拔的安平生）还先于全国率先点名批邓、并建议中央在全国公开点名。1980年代的“否定文革”理论上是要否定造反派的，在广西“处遗”却主要是为造反派讨公正，这样的处遗能够实现，除了直接过问广西问题的胡耀邦、习仲勋、宋任穷、李锐等人可贵地坚持了实事求是外，也与广西当局这次跟风失算有关。

46. 李秉元：《沉痛悼念我的父亲李明瑞烈士》，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4964/145228/8953925.html>

47. 戴维堤：《逝者如斯》之73《北航黑会》，乌有之乡网站

48. 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尤为典型。各地军方“支左”后，收拾造反派大都是首先拿工人组织开刀，因为学生社会经历相对单纯，不易找到把柄，而工人，尤其工人中那些呼风唤雨者往往经历相对复杂，当局镇压较易找到借口。所以1967年后各地的“逆流”和“反逆流”常常是以军方首先把工人组织打成“反革命”，而学生造反派为之打抱不平，与军方发生冲突的模式演进的。

49. 王洪文其实是保卫干部，并非真正的工人。不过当时工人组织的头头很多都如此，如湖南的叶卫东、湖北的朱洪霞、广西的白鉴平等。其实就是传统的工人运动中，出头“代表”工人的往往也不是工人，如当年安源的李立三、江岸的施洋，只要真出于工人的推举授权，其工人代表的资格就不是问题。有趣的是文革中工人造反派被镇压时，不是工人的头头就成了“阶级异己分子”，而受宠的王洪文自然没有此厄。

50. 北京的造反从未提出反“经济主义”的问题，毛泽东也不指望他们提出，因为毛对他们的利用就是为对付刘少奇。上海则不同，没有张春桥点拨下的这个“创造”，“一月革命”是不可能有所谓的地位的。后来各地仿效上海的“夺权”基本都失败了，取代旧党政的“革命委员会”基本都是“军政府”或广西那样的“旧政府”，上海则不是，因为早在“反经济主义”时基于百姓利益诉求的“造反”在那里已经消灭，而在其他地方都是要靠“军政府”或“旧政府”来消灭，才能建立“新秩序”的。

51. 参见李逊：《砸“联司”大武斗之前——上海柴油机厂两大派群众组织对立的形成及社会化过程》，<http://www.aisixiang.com/data/38262.html>

52.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343页。

53.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121页。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亡灵祭坛】

## 清华大学“文革”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统计表

• 唐少杰 •

1. 史明远，男，1936年生，清华大学自控系助教，共青团员。1966年7月5日在京郊十三陵服毒药身亡。

2. 郭兰蕙，女，19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1966年8月20日因所谓“家庭出身不好”遭红卫兵同学的“批斗”，服毒药后被阻拦救治，身亡。

3. 候协兴，男，1937年生，清华大学建工系给7班学生，群众。1966年8月26日在清华2号楼五楼（层）上，跳下自杀。

4. 刘澍华，男，1937年生，清华大学附中物理教师，附中校团委副书记，中共党员。1966年8月27日凌晨在清华公寓小区，从高烟囱跳下自杀。

5. 王章，男，1933年生，清华大学行政生活处第三饭厅炊事员。因不满清华工作组的做法，在清华生物馆内被关押，1966年9月25日上吊身亡。

6. 佟英亮，男，1908年生，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门卫。1967年1月9日在北京林业科学院附近上吊身亡。

7. 张怀怡，男，1945年生，清华大学工程数学力学系力901班学生（团支部书记），中共预备党员。因日记中被发现有“反革命言论”，受到批判，1967年3月25日从清华学生宿舍2号楼顶跳下身亡。

8. 肖化时，男，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无706班学生，中共党员。1967年8月1日参加武汉造反派群众组织的横渡长江的活动时，在与武汉“百万雄师”进行的武斗中致死。

9. 李磊落，男，22岁，清华大学电机系电9班学生。1967年8月7日在湖南常德参加群众武斗，乘车转移伤员时遭遇机枪扫射致死。

10. 刘庆（刘仁堂），男，23岁，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无91班学生。1967年8月中旬在辽宁鞍山市参加当地群众武斗时致死。

11. 关于正，男，22岁，清华大学动力与农业机械工程系农9班学生。1967年8月29日在江苏南通市参加当地群众武斗时，被流弹击中致死。

12. 周定邦，男，1930年生，清华大学水利系水力学教研组讲师，1953年加入中共，1957年左右被开除党籍。1967年12月25日在宿舍跳楼身亡。

13. 黄报青，男，1929年生，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系党支部委员、副教授，民用建筑教研组副主任。1968年1月18日跳楼身亡。

14. 姜文波，男，清华大学建筑系给01班学生。1968年4月26日被团派武斗群众追赶，跳楼摔死。

15. 谢晋澄，男，24岁，清华大学自动化系自94班学生。1968年4月29日武斗中被团派汽车撞压致死。

16. 孙华栋，男，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无01班学生。1968年5月15日被团派武斗人员绑架，遭毒打致死。

17. 许恭生，男，24岁，清华大学冶金系冶82班学生。1968年5月30日大武斗中，在东大操场北侧，被414派群众长矛乱刺致死。

18. 段洪水，男，19岁，清华大学修建队工人。1968年5月30日武斗中，在攻楼时，被414派众人长矛刺中，摔下梯子致死。

19. 卞雨林，男，清华大学化工系003班学生。1968年5月30日武斗时，胸口被团派武斗者射出的毒箭（体育比赛用箭）击中，致死。

20. 周久庵，男，1907年生，清华大学图书馆职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68年6月4日在北京大学靶场西侧水坑内，溺水自杀。

21. 张义春，男，1921年生，清华大学体育教研组讲师，群众。1968年6月在宿舍自缢身亡。

22. 刘承娴，女，清华大学统战部副部长，中共党员。1968年6月18日在团派看守处跳楼身亡。

23. 朱玉生，男，清华大学建筑系房01班学生。1968年7月4日武斗对峙中，在科学馆外战壕中被团派枪弹击中致死。

24. 杨志军，男，清华大学电机系电01班学生。1968年7月5日武斗对峙中，在科学馆外修筑战壕时被团派枪弹击中致死。

25. 杨树立，男，清华大学动力与农业机械工程系汽车拖拉机实验室实验员。1968年7月6日乘坐土装甲车外出购菜，被团派开枪击中心脏致死。

26. 钱平华，女，23岁，清华大学自动化系自802班学生。1968年7月18日从家乡返校，在清华主楼前被团派枪弹击中致死。

27. 范仲玉，男，清华大学修建队工人。1968年7月28日凌晨，乘车撤离途中，因同车团派的手榴弹拉环拉出，翻车爆炸致死。

28. 范崇勇，男，清华大学中等技校学生。1968年7月28日死亡，死因同上。

29. 赵晓东，男，1910年生，清华大学附中体育教研组组长，中教二级教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押，1968年8月9日从清华附中四楼（层）跳下身亡。

30. 陈祖东, 男, 1912年生, 清华大学水利系施工教研组主任, 教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追查他自己和别人的“历史问题”, 1968年9月20日在圆明园遗址上吊自杀。

31. 黄志冲, 男, 1934年生, 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系党总支副书记。1968年9月26日在清华荷花池二宿舍本人住室自缢。

32. 周华章, 男, 1918年生, 清华大学基础部, 数学教研室教授,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68年9月30日在其住所跳楼自杀。

33. 徐毓英, 女, 1932年生, 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讲师, 中共党员。1968年10月9日离校出走, 死于武汉长江(死亡方式不详)。

34. 王慧琛, 女, 41岁, 清华大学基础部外语教研室教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 1968年11月6日在北京香山公园, 与丈夫殷贡璋一起上吊自杀身亡。

35. 殷贡璋, 男, 42岁, 清华大学基础部外语教研室教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 1968年11月6日在北京香山公园, 与妻子王慧琛一起上吊自杀身亡。

36. 杨景福, 男, 36岁, 清华大学基础部外语教研室教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 1968年11月6日跳楼自杀身亡。

37. 程国英, 男, 1922年生, 清华大学建筑系美术教研组副主任, 讲师。1968年11月12日在清华园荷花池南边土坡上自缢身亡。

38. 于贵麟, 男, 1928年生, 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工人。1968年11月28日在陶然亭公园南豁口, 投河自杀。

39. 李丕济, 男, 1912年生,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押时, 在1968年11月29日跳楼自杀身亡。

40. 邹致圻, 男, 57岁, 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 1968年12月10日跳楼自杀身亡。

41. 程应铨, 男, 49岁, 清华大学土木系, 讲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 1968年12月13日投水自杀。

42. 李文才, 男, 46岁, 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副主任, 总支书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 1969年1月9日在家中上吊自杀。

43. 路学铭, (路学周), 男, 41岁, 清华大学体育教研室讲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 在1969年2月8日跳楼自杀。

44. 李玉珍, 女, 58岁, 清华大学图书馆职员。“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 在1969年4月23日跳楼自杀。

45. 王大树，男，31岁，清华大学电机系助教，“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1969年5月24日在大兴县红星公社一村庄附近服毒自杀。

46. 邢孝若，女，1907年生，清华大学图书馆在编临时工（采编）。1969年12月29日在清华16公寓跳楼重伤，1970年5月19日死亡。

47. 荐健，男，1946年生，清华大学动力与农业机械工程系汽车02班学生，共青团员。1970年3月在泰山舍身崖跳下身亡。

48. 杨哲明，男，1933年生，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工程制图教研组党支部书记、讲师。1971年2月9日在精密仪器系楼馆内上吊身亡。

49. 栗乃志，男，1946年生，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物00班学生，后留校任教，2000号试验化工厂学生党支部书记。清查“五一六”时受审查，1971年2月11日在清华2号楼四层楼顶层，跳楼身亡。（原编者注：记录在档案上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屈死的“516”冤魂——栗乃志》一文作者王克斌写道：栗乃志是从北大200号宿舍楼楼顶跳下身亡的。王参加了次日晨对栗自杀的声讨会。编者向一位与栗乃志同系同时留校、当时与栗同住在与清华200号相近的北大200号宿舍楼里的魏同学求证，得到确认。他是栗跳楼以后的现场目击者。）

50. 陈贯良，男，1946年生，清华大学电机系发01班学生，共青团员。清查“五一六”时受审查，1971年3月在清华大学江西南昌郊外鲤鱼洲农场跨越马路时，趁人不备钻进行驶中的拖拉机下，被车碾压身亡。

51. 韩启明，男，1923年生，原清华大学汽车队司机，后调原籍河南杞县医院，清查“五一六”时调回清华重审。1971年7月18日在清华校外大石桥处，割断大动脉血管自杀。

52. 周寿宪，男，1925年生，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副教授。1976年5月在其住所跳楼自杀。

53. 罗征敷，男，28岁，清华大学干部罗征启之弟，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1968年4月4日团派抓捕罗征启未遂，绑架其弟，其弟遭毒打及被踢断两根肋骨后，被用棉丝塞住嘴，装入汽车后箱内拉回清华，窒息死亡。

54. 韩忠现，男，36岁，北京第一食品厂革委会委员。1968年7月27日在9003大楼三楼一房间休息时，被团派长矛刺死。

55. 李文元，男，36岁，北京橡胶四厂工人。1968年7月27日在9003大楼外被团派开枪打死。

56. 王松林，男，36岁，北京第二机床厂副科长。1968年7月27日在学生宿舍10号楼一楼楼道里，被团派手榴弹炸死。

57. 潘志宏，男，30岁，北京供电局工人。1968年7月27日在学生宿舍12号楼西北处附近，被团派手榴弹炸死。

58. 张旭涛，男，39岁，北京541厂工人。1968年7月27日在东大操场南端的撤退路上，被团派长矛刺死。

说明

- 1、本统计表中的空白之处为相关信息不详。
- 2、本统计表是按照死难者去世的大致时间顺序排列的。最后六位死难者尽管不属于清华大学人员，但是他们是由于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而牺牲的，故把他们列为表中的最后。
- 3、本统计表在修订过程中得益于唐金鹤学长、孙耘（孙毓星）学长的指正，在此，谨致谢忱！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千秋功罪】

林豆豆——现代史上最大的悲剧人物

• 芦 笛 •

写完了《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后，不由得沉浸在对林豆豆的巨大悲悯之中，和刘涛一样，她乃是那个灭绝人性的制度制造出来的最可悲的牺牲者。

读者大概可以看出，林副就坑在立衡与立果一对活宝手上。

许多国外观察家不明白，9届2中全会后，面对伟大领袖举起的屠刀，百战百胜的天才元帅何以如此消极被动。

的确，从表面上看，“牛耕田，马吃谷”，中央文革在前头亲冒矢石，辛辛苦苦打倒党官僚，却让林副一系在后面坐收渔利，纷纷出任各级枢要，以致林副三分天下有其一。既然如此，林副何不放手与伟大领袖一搏？以他之用兵如神，正未知鹿死谁手。

观察家们不知道，林彪派系确实在文革中急剧扩张了，但那不过是潜势力，在毛死后确实举足轻重，在毛生前却是画饼充饥。林根本调不动一兵一卒，有什么本钱和毛较量？毛掌握了所有兵力，而林连自己的警卫部队都控制不了，能成功逃出中国，就算了不起的“胜利大逃亡”了。

由此看来，林副在庐山会议后“清静无为”，其实是最佳决策。我已经指出，毛林是同一造神运动造出来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体胎。这“造双神运动”既使得林无法公开反毛，也使得毛难以公开倒林。要明白后面这点，只需看看毛为了证明“到底是谁对不起谁”，被迫向全国人民公布那痛骂他“披着马列主义外衣，行秦始皇之法”的《571工程纪要》就够了。

即使有了那些“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证据”，林彪事件还是让毛五痨七伤，一病不起，再也没能从那沉重打击中恢复过来。那么，假设立果少爷什么也没干，林副也没仓惶出逃，毛到底能用什么理由，堂而皇之地把林彪整死？据说那是他老人家鉴于赫鲁晓夫篡党夺权的教训，考察了几十年才亲手选定的最可靠的接班人啊？

我已经指出，“批林批孔”运动完全是闹剧。从林彪的公开言论中，伟大领袖根本找不出任何把柄，因为那完全是毛思想最高最活的发挥，要批就只能批到自己头上。所以张姚只好乞灵于从毛家湾抄出来的条幅，根据什么“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等片言只语，莫名其妙地将副统帅与孔老二挂上钩，以“批孔”来偷换“批林”那不可能解决的难题。如果林副不是仓惶出逃，则恐怕连这点“证据”都不会留下来，那张姚还能批什么呢？

这当然不是说伟大领袖会网开一面。立果少爷早就在《纪要》里说了，伟大领袖的特点是“一旦得罪人就得罪到底”。不动手则已，一动手就绝对不会半途而废，而他搞掉林的决心已经在南巡讲话中暴露无遗，特别是在9月12日中午在丰台召见吴德等大员时，那杀气腾腾的口气，吓得吴德一怔一怔的，不知道该怎么传达那最新指示。

正因为伟大领袖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才想不出来他怎么去解决这不可能解决的难题：假定林副软顶到底，就是不悔罪，但也不自卫，伟大领袖当然可以把他抓起来，像整治刘少奇那样把他整死，但又该如何去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交代？那交代可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不符合他的流氓段位。

我想，这就是林彪何以毫无抵抗的原因吧。他大概看穿了这一点，发现自己和正统帅处于同一难题之中，彼此都让造神运动捆住了手脚，将死了军。可惜少爷见不及此，主动去帮正统帅解决了这一难题。

比起郡主来，殿下闯的乱子根本算不了什么。亏豆豆还指责李文普是毛安在林副身边的“卧底”，她才是伟大领袖安排在副统帅身边的活Q听Q（窃听器），亲手把她爹逼上黄泉路的克格勃。如果不是她大义灭亲，毅然举报她亲生弟弟和亲娘的谋反大罪，则那三人也不会不顾一切地出逃，完全可以从容不迫地布置得更周密些，因而也就更安全些，何至于葬身大漠中？

《三国演义》上，袁绍不用田丰之计，还杀了他，后来兵败，头给割下来送到千里之外去报捷。罗贯中作诗悼曰：“头颅行万里，失计杀田丰”。敬爱的林副的头颅行得更远，到了莫斯科，后人作诗悼之，应该是“头颅行万里，失计育两童”，也就是毁在立衡立果两神智不清的乳臭小儿身上。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无论是首长，是主任，还是林部长，都已瞑目长逝，什么都不知道了。真正日日夜夜受良心煎熬的，还是林立衡女士，她才是这场悲剧的最大的受害者，是那灭绝人性的制度的主动殉道者。这就是她何以发誓将余生用在为她父亲平反昭雪之上——那是她唯一可以求得良心平安的手段了。“

我到现在也无法理解那种革命家庭：林立衡受罪，始于立果向她和盘托出密谋的那一瞬间。作为无限忠于伟大领袖的革命战士，她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谋反大罪。为此，她可以毫不犹豫地中央举报，并多次请求警卫部队把她亲娘和亲弟弟抓起来，而这只意味着两人将被军事法庭审判后枪决。对此严重后果，她那现役军人绝不会不知道，但她却毫不犹豫地这么作了，唯一的指望是保全她爹。

任何一个平民子弟都能看出这种幻想是何等滑稽：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更何况伟大领袖早就卯足了劲要整她爹，而她也不是不知道这点（她完全知道庐山会议内容，更别说立果一定会向她传达过毛的南巡讲话），怎么还会产生这种天真幻想呢？但她就是从头到尾都坚

信可以用牺牲她娘和她弟的方式保全她爹，事过几十年还执迷不悟，至今还在以那荒诞不经的说法坚持她的 personal crusade，以为可以说服现中央为她爹平反！

世上怎么会有这种家庭？为何豆豆就是不能跟最宠爱她的亲爹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为何不能先和她娘、她弟弟举行严肃谈判，以“我要向中央举报”的威胁，吓阻对方轻举妄动？哪怕是从毛的革命路线标准来看，这也是挽救同志的正确作法吧？为何连个最后通牒都不下，连让她爹娘弟弟悬崖勒马的机会都不给，就去背着家人进行阴谋活动，试图把秘书、卫生员、警卫部队等等拉过她那边去，无效后竟然向低于她爹的“中央”举报？难道与自家亲人沟通，竟然是毫无可能的事，以致她必须借助外力来解决家庭纠纷？

悲剧在于，这种怪事在革命家庭中决非绝无仅有。当初刘涛同志就曾欺骗其继母王光美，电话报告她说刘平平遇到车祸，重伤入院，吓得光美同志直奔医院，被早等在那儿的清华造反派“智擒”，押到清华去百般侮辱，用乒乓球做了个项链给她戴上，弄了件烂旗袍让她穿上，拍了许多丑态百出的照片流传全国。刘涛还动员她生母写了许多大字报，揭发少奇同志的许多隐私。诸如什么少奇同志嫌她生母手上有伤疤难看，要她戴手套遮丑等等，那脍炙人口的“金鞋拔”就更不用说了。

记得我当时看到那些丑闻时，觉得其实“新”社会的一夫一妻制还不如“旧”社会的一夫多妻制。

在一个男性社会中，“男人富贵必易妻”乃是客观规律，你承认它是那样，不承认它也是那样。“旧”社会承认这点，实行一夫多妻制，让男人在事业成功之后既能如意获得新欢，又保留了糟糠之妻的崇高地位，完美实现了老中青三结合。而“新”社会不承认这个客观规律，于是不是制造出贺子贞那样的疯子来，便是制造了少奇和林副的前妻那些不共戴天的仇敌。

这当然只是题外话。我死也不明白的是，血缘形成的强大纽带，为何会在革命教育面前脆弱到不堪一击的程度？无论是刘涛还是豆豆，背叛家庭似乎就跟上街买东西一样自然。豆豆在举报她娘和弟弟的杀头大罪时，似乎根本就没有遇到什么不可跨越的感情障碍。

说到底，豆豆的唯一烦恼，似乎就是中央不该冤枉了她爹。假定伟大领袖满足了她这一合理要求，及时下令 8341 部队把叶群和林立果抓起来，组织军事法庭审判之后，枪决了两人，同时令副统帅与他们划清界限，以此作为保留他位置的前提，而副统帅也从命了。那么，豆豆是不是就可以心满意足，此生再无遗憾了呢？

还不止此。无论是豆豆还是前驱刘涛，都在事后无任痛苦地发现，其实出卖亲生父母，并不可能换来伟大领袖的信任。两人都只有瞬时利用价值，事过境迁便立刻弃之如敝屣。林副才上天，汪东兴便在电话中对立了大功的豆豆毫不客气，指责她报告太晚，说现在没空跟她多说，便粗暴地挂了电话，竟然连句安慰话都没有。此后豆豆更被我党审查多年，终生成了怀疑对象。如果我党不是如此薄情，而是赏以重任，将其提拔到王洪文那样的位置。那么，豆豆今天还会把为她爹平反昭雪当成余生的唯一目标么？。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此何人哉！

在毛共执政 30 年中，类似的悲剧不知道发生过多少。许多热血青年在土改中带头斗争自己的地主爹娘，导致父亲被活活打死。后来才无限痛苦地发现，自己非但没因此赢得我党

赏识，反倒成了“杀关管”家属，属于“与我党有杀父之仇”的天然怀疑对象。刘涛、豆豆与那些黑崽子的区别，只在于“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而已。

敬爱的林副统帅英明地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过去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这话胜过了春桥同志的千言万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实质。

我已经反复指出过，国际共运之所以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最灭绝人性的反动事业，恰在它在“道义”上的“完美无缺”。它比法西斯更具有欺骗性之处，就是它“代表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正义性”。列宁主义的要义是，只要是出于广大人民的利益需要，就什么无法无天的烂事都可以干，什么下流手段都可以使出来，什么冤案都可以制造，什么人都可以杀害，那乃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必须付出的正当代价，用思云的话来说，乃是必须打破的“一些坛坛罐罐”。

这种理论必然把“人民利益”的解释权与代表权归结于共产党，最后归结于党领袖一人。因此，斯大林主义是列宁主义的必然归宿：列宁只是以革命名义屠杀党外人士，而斯大林则发展到了以革命名义屠杀党内所有的假想敌，这一切犯罪活动都在“人民利益需要”的借口下得到了合理解释，这就是毛指出的“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的实质。

伟大领袖在这上头其实没有什么独创性，他完全是斯大林的忠实弟子。据他自己说，他看了四遍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受了深刻教育和启发。那启发是什么？一曰重写历史，把苏共所有的成就都说成是斯大林一人的功劳。二曰“路线斗争”，亦即把党内的政见分歧乃至权力斗争都说成是敌我斗争。任何人胆敢不同意斯大林，哪怕只是在策略上的轻微歧异，或是让他感到自己的权位受了威胁，都要被当成间谍无情消灭。

这就是毛的“路线斗争”的理论来源，也是文革爆发原因。他唯一有别于斯大林之处，乃是后者习惯于欧洲式高效率，直接把权力斗争对手毙了了事，而毛则使用暴民运动来收拾他们。毛的这一发明，使得全民毫无必要地介入了高层权力斗争，极大地败坏了人民的心术，因而以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制造了刘涛、豆豆那种灭绝人性的牺牲品。这些人坚信，世上最高的正义，就是伟大领袖代表的广大人民利益，为了这至高无上的正义，父兄可卖，亲娘可弑，没有什么事是人不能干出来的。

吊诡的是，正是伟大领袖发动的文革，拯救了许多高干子弟甚至高干本人，使得他们找回了迷失已久的人性。

文革后出了许多“伤痕文学”作品，其中最感人的，乃是陶铸女儿陶斯亮写给她爹的《一封没有寄出的信》。我至今难忘的乃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情节：

陶铸倒楣后，全家自然跟着倒楣。作父亲的当然知道我党的厉害，他那独生女儿从此再无前途可言，找对象是再别梦想了，而她不幸已经到了待字闺中的年龄。

不料一日陶斯亮却对她爹说，有人追求她。他喜出望外，赶快向她交代自己的问题，为此受尽折磨：说重了，怕吓跑了对方；说轻了，又怕成了欺骗对方。交代完后，陶斯亮乃出去见她那新交上的男友，留下老头在屋里团团转，揣测此行吉凶。好不容易盼到她女儿回来，得知对方并没有给他的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吓跑，不由得喜心翻倒，连声大叫：“我的亮亮有男朋友了！”

当年看到这一段，泪水婆娑，打湿了报纸。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在神州大地上无数次发生的黑六类们的悲剧，竟然在无产阶级革命家家内一模一样地重演，当下只想放声高呼：“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

为什么好？因为它请君入瓮，让那些铁石心肠的革命家尝到了千千万万被镇压、被清算、被侮辱、被压迫、被损害的革命对象的滋味，让他们平生首次获得了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的难得机会，亲身感受革命的血腥残忍，亲自体验那制度的灭绝人性，从而获得了找回久已迷失的人性的宝贵机会。这应该说是老邓复出后不但给老干部平反，还为黑六类摘帽，从而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比纳粹迫害犹太人还丑恶的一章的心理原因吧。

的确，在各级干部子弟的回忆录中，无论是《鸿》，还是《点点回忆》，我都看到了这种被扭曲、被压抑的人性复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文革中被整的革命家庭，远比那些逃过文革风暴的干部家庭更幸运。无论是张戎，是陶斯亮，是罗点点，还是刘少奇家的大部分子女，良心都远比豆豆更清白，人性都远比豆豆更健全，余生当然也就比豆豆更平安喜乐。

正因为此，豆豆才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可悲悯的悲剧人物，良心上压了父母和弟弟三个血亲三条命，我实在无法想像一个人如何能从这种无边黑暗中挣扎出来。

人世最可怕的邪恶，乃是以罪恶手段推行的完美无缺的正义事业。世间最可悲悯的悲剧人物，乃是自觉主动献身给这种正义事业的崇高殉道者。

2006年1月26日

~~~~~

## 【人物春秋】

### 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疑惑——记朱永嘉先生

• 朱学勤 •

1976年10月“怀仁堂事变”发生，我在陇海线一个山沟里当工人，每日里，只见军车东下，直奔上海而去；文件西来，声讨“上海帮”密谋暴动，一定要彻底解决。此前盼文革垮台，已有数年。但听那些文件传达，改不了的文革腔，以文革否定文革，看不到多大希望。

后来听第二批文件传达——“反革命暴乱”如何被“粉碎”，倒觉那批留守上海的地方头目有点像本地人了。大军压境，立受招安，检讨、揭发、输诚，要什么给什么，哪有一点暴戾之气？很符合上海小市民的庸人习气。可见左派们在这个城市活动多年，就算把握政权也呈悬浮状，或地下或地上，就是不能站稳地面，一接地气，终被软化。究竟是革命改造城市，还是市民软化革命？纷纷扰扰中，文件传达越来越多，心猿意马，昏昏欲睡。忽听一句大黑话，让我眼前一震、内心一惊。那文件说，王张江姚被捕后，“上海帮”群龙无首，居然有人在会议室倡言：“我们应武装抵抗，抵抗一星期，上海就能成为又一个巴黎公社！”这句话成为“暴动”铁证，此后在文件中反复引用，也像刀刻一样在我心里30年，不能忘却。须知说话者并不是军人，竟是一介书生，从复旦提拔上去的一位中年史学家，大概是读历史读多了，1976年竟引用“1871年巴黎公社”。说完后，北京方面不动声色，允许他按原定日程访问日本。归来落虹桥机场，下机即逮捕，入狱14年。

14年后，轮到我在复旦念博士，不幸读历史，专业也与“巴黎公社”相近，自然就打听这位史学前辈。一般来说，“文革”垮台者在本单位都有坏名声，不是搞特权，就是整死人，而他似乎是个例外，听不到有幸灾乐祸，言者多为惋惜，间或还有同情。他本来是功底深厚的明史专家，1948年入党，曾任复旦历史系总支书记，1964年，组织该系几个青年讲师讨论“李自成晚节不忠”、“农民战争史”、“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等，起名“罗思鼎”（螺丝钉）。华东局正要组织反修写作班，闻讯遂将这个小组合并，搬进上海西区李鸿章为爱妾购置的“丁香花园”，集体笔名“丁学雷”，丁香花园学雷锋。他在“丁学雷”统领历史组，“文革”中分管上海文教，相当于今天的宣传部长，却未搬进上海西区，住复旦老房子，拿讲师工资。姚文元在北京有急事，电话打到复旦家属区，门房老头去他门前喊，他赶过来接，差一点误事。姚才知道“宣传部长”家里没电话，赶紧指令有关部门给他装上。1974年周恩来四届人大组阁，曾点名要他进京任科教文卫组组长，相当于今天的文化部长，张春桥不放，拿于会泳顶替，后者“怀仁堂事变”后自尽，可谓替他一死。他本人一直在上海任市革会常委，1976年被揭发有“巴黎公社言论”，加重刑期。秦城生涯中，有一次狱外就医，门开处，迎头撞见陈伯达，遂知陈为隔壁邻居。刑满释放回复旦，发200元生活费，不恢复公职。当时说定即此封顶，再不增加，十几年内物价翻几倍，不能不增加，到目前为止，生活费不足千元。他出狱那一年我自己也不方便，有心相见，缘慳一面。又过十一年，他关注我发表的一些东西，托人带话，问愿不愿见？这才有了机会。记得是个大热天，他穿磨薄了的老头衫，手执蒲扇，满头白发不显老，眉宇间隐隐有大气，确实是前辈，拿得起放得下的前辈。

此后冬来夏往，我有“文革”史疑惑，常去询问。林立衡一行来上海，我请老先生出来聚餐，戏言：“相逢一笑泯恩仇，也让你们两个冤家见见面？”宾主尽欢，众白头共话天宝当年。当时在四平路，离空四军军部不远，老先生忆旧说“文革”中他有一个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姓李，不关心革命化却鼓吹现代化，江湖上薄有名声，林立果闻言，就在空四军军部召见。听一番现代化宏论，“太子”大悦，传令特招，纳入麾下。军装刚上身，“9·13”事发，那人剥下军装进隔离室，此后销声匿迹。宋德金先生196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曾调入毛家湾任秘书，“9·13”后隔离清查10年，出来后曾任《历史研究》主编，那时已退休，随行来沪。闻老先生此言，补白曰：他召入毛家湾只是读文件，林寡言少语，深浅莫测。他与林面谈时间最长一次，乃是遵其令，事先准备一堆英、美、德、法、日史料，专题汇报大国如何现代化。我闻宋氏言遂有补白之补白：30年后今天，南京大学英国史专家入中南海讲史，给第四代领导人讲的也是这个题目，《人民日报》刚发新闻，头条头版。

还有一次是在“丁香花园”，昔日禁苑今已开放为营业性餐馆，门庭若市。老先生30年后重游，自有一番感慨：刘亚楼死在哪一栋楼；戴厚英如何获“小钢炮”外号；秀才加班，夜餐为一碗光面；中日建交，周恩来来沪传达毛泽东与田中角荣谈话，突然说要请客，在座者每人发一根雪糕棒冰。那天徐景贤也在，两人相互补正口述史，也有意思。老先生说，大约1974年前后，毛泽东想读庾信《枯树赋》，传谕“丁学雷”点校呈送。他在这栋楼内加班加点，点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一句，已感觉毛内心苍凉，事事不如意，“文革”前景不妙。徐景贤说，“9·13”事件后，张春桥在上海试行“破资产阶级法权”，徐让市革会财政组拿出方案，发现此事经济上行不得：干部人数、生活待遇相比进城之初的供给制，已经发展出汽车、洋房、司机、保姆等一大摊，如欲恢复供给制，财政负担将比薪给制高出数倍，不堪重负。遂悄然搁置。徐最后一次进京见张，后者深感寂寥，有如下言：“有时候我坐在这里看文件，一整天只说6个字，早晨服务员送来早餐，我说‘谢谢’，中午又是‘谢谢’，晚上也是‘谢谢’。这样，一整天3句话、6个字就过去了。没有什么人来，真的是‘门可罗雀’。”

我曾不止一次问老先生对“文革”看法是否有改变、怎么改变。他是史学家，又为海瑞罢官、巴黎公社“历史问题”入狱，倘有兜头反思，一定打通古今、大彻大悟。第三次问，他正回忆“文革”中“巴黎公社”来龙去脉，手蘸茶水在桌上比划：“一条是西洋进来的意识形态，一条是老祖宗留下的本土古制，两条线一条都不能少，交叉处，能找到‘文革’定位。”交往深入后，也能问一些比较敏感的个人问题，比如为什么会有那句“巴黎公社”？我的历史观不喜欢巴黎公社，也不赞成“文革”中巴黎公社之延伸，但还是敬重他当时敢言之勇气。不料他回顾1976年心理，略有沉吟，回答说：“人家对我不薄呵！”这句话再次让我震惊，原来士为知己者死，这就不是1948年入党的共产党人了，而是巴黎公社油彩下的中国古士人。难怪他到我seminar给研究生讲秦汉制度，携一蓝布包袱入，坐定后一层一层揭开，最里一层才是讲义，学生问“文革”起源，他要从殷周讲起。一研究生事后惊叹：“这是活在当下的古人，有古人之风！”

我们这一代启蒙读物，有一些是“文革”中上海出版的内部书籍，世称“灰皮书”，还有一些杂志，如《学习与批判》，如《摘译》（分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后来知道这些出版物皆为他主持，“文革”前编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12本，那时也开始重印，周恩来在京闻讯，曾让秘书打电话请上海邮寄。知道这些情况后，我问他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怎么会想到出版这些东西？他的回答是：“老人家那时有指示，说要‘反对形而上学猖獗’，通过张、姚布置到我这里，指示不能违。我自己确实也想出一点有文化有知识的书籍，如果有私心，只是念及那么多中学生在乡下，1000多万人无书可读，怎么得了？”后一番话触动我心底，回家与妻子说：“老先生正面做的那些‘文革’事不结善果，侧面播下的读书种子却在我们这一代发芽。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这些人能破土而出，是不能忘记他的，这是他的收获。”妻子当年也读那些书，劝我将这层意思向老先生点破，也好让他有个安慰。不料他听了以后无所动，似乎没啥稀奇。

他是无锡大户人家出身，半个世纪前在复旦读书就背叛家庭参加革命，并不在意这些。1976年巨变，下狱前开除党籍公职，母亲却在同一年落实政策，得一笔退款，写信问需要什么，他回信说：“里面有点冷，送一套棉毛衫裤，加一套二十四史。”此前他为革命治史，或为伟大领袖点校诗赋，无暇细读二十四史，这一次有的是时间了，却无力购置。于是“剥削阶级”母亲出手，用“落实政策”退回的“人民币”，给“革命逆子”购置“二十四史”，向铁窗内邮寄。二十四史太沉，从上海提篮桥转狱去秦城，狱卒搬书发有怨嗔：“你这是孔夫子搬家，除了书，还是书！”更滑稽的是，那一年他进提篮桥，复旦中文系老教授贾植芳因胡风一案平反出狱，一进一出，居然是同一间牢房，贾先生特意关照他所熟悉的狱卒，要善待这位刚进去的狱友。这些事发生在1976年，可与《基督山恩仇记》开头媲美，一起一伏，一进一出，颠扑如戏。我历来认为本国上世纪史最为生动，且将那些真人真事如实道来，毋庸虚构，即可把19世纪巴黎文人那一点小说滥情比下去。他听后也是心不在焉，似乎所有思维细胞都已经历史化，不给文学留下空间。

他的人性柔情这一面，是我在夏天去偶然看见的。天热，他门前有一棵树，他坐树下翻阅书报，一方凳，一竹椅，一壶水，一副老光眼镜。树影摇曳，有三五只野猫来脚下寻食，他竟有耐心起身喂食，口中还喃喃有语。我看那盆猫食，是煮熟的，可见他日日如此，每天下午都在等这群老朋友来见。冬天去，野猫不见了，陋室内堆满古卷，老房子年久失修，1930年代日本人留下的木结构，门窗皆漏风。室内只有两张老式的学生床，下一层留出床沿当座位，上一层书摞书，摇摇欲坠。主客对坐，也是隔一张学生桌，青灯黄卷，冷风嗖嗖。我扛不住冻，大衣不能脱，他穿棉裤棉鞋，也不说冷，数着刚完稿的古籍点校本，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是《淮南子》，60万字，那是《唐六典》，100万字，还有20万字

长序。可以了吧？可以啦，比那时好多了！”他说的“那时”，是指丁香花园学雷锋，为领袖点校大字本；还是秦城铁屋为自己读二十四史，一读14年，终于读出历史深处的滋味？

前年他心脏动手术，医疗费沉重。此前我多次起念，请他来 seminar 给研究生讲讲他的史学，满肚子学问还有阅历，不说太可惜，也好以此理由开列讲课费，略尽心意。每次提，每次都被他拒绝，怕给我惹是非。这一次他终于同意了，我们父子俩很高兴地去接。路过1976年他初次被关押的军营，我让儿子等一等，陪他从围墙边踱过去怀古。隔一条小河，他辨认出那间房子，笑微微地说：“不就是那排灰营房吗？没变，没变。当时从虹桥机场押进这个大院，他们要保密，我是一眼就认出来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团部！每逢“八一”，我要领队来慰问，熟门熟路。上海我是第一个关进去的，编号为01。”说完用食指在空中画圈，圈里画“1”。

原来又转出一层历史，凡有历史处，总要戛然而止。预定讲一个学期，结果只讲了一次。但也留下了一处痕迹：那次讲完秦汉古制，学生领来讲课费，我签字，也须请老先生签字，他却为我顾虑起来：“签名恐有不宜，会给你留下麻烦的。”我说也是，你也不在乎笔名多少，刚才提到那个“01”就不错，新开一个吧？老先生展颜一笑，大笔写意，就签两个字：——“凌伊”。

□ 原载：《共识网》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